

2006年，为制作纪念佐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专题，我带记者拜访了黄蜀芹。黄蜀芹说，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纪念他了，以后知道他的人，只怕越来越少了。她幽幽地说，我静静地听，她语气中的寥落，就像黄昏里的秋雨。黄蜀芹拿出不少照片和一本《我与写意戏剧观》，说照片只能当场翻拍，书还有很多，这本可以送您。我本想说已有，我对令尊大人的了解，大多是从这本书里来的。然而听她言语，看她神情，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

照片翻拍完毕，我们告辞。黄蜀芹送到电梯口，淡淡地问：“您很年轻，但我父亲知道不少……您见过他吗？”

安顿

苏剑秋

原本我对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的记忆是模糊的。这也难怪，五百年前卡拉瓦乔仅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短短的三十七年。关于他的种种记载以及为数不多的油画作品神秘消失了。沉寂了又将近数百年，直至上世纪二十年代后，人们似乎发现了这位意大利米兰生的小伙子除绘画天赋以外的另一面。于是，无数人到处发掘整理有关卡拉瓦乔的一切，艺术文学电影一哄而上。而乘着我国改革开放东风，卡拉瓦乔也从门隙中跃入我们眼帘。

油画艺术之于卡拉瓦乔与生俱来。在意大利的米兰、罗马，卡拉瓦乔一生颠沛流离，为生计，帮其他画家做“枪手”。《鲜花和水果》就是那一时期的作品，他出入于上流社会，四处混迹，生活狂放无羁，成名速度加快，跌下低谷也就为期不远了。从不多的史料中，依稀窥见他的性格，每次命运的转折总是姗姗来迟。他一生的绘画创作向平民倾斜，画生活的常态。《算命者》描绘马里奥正在被一个吉普赛女郎欺骗，《纸牌作弊老手》表现另一个不懂世故的男孩落入纸牌骗子的圈套，那种心理复杂化的刻画堪称一绝。他具有超现实主义的灵魂，成为那时罗马的新星，影响整整超过一个世纪有余。人们后来评价卡拉瓦乔是现实主义画派的先驱。

卡拉瓦乔的艺术世界，提醒着人们所在时代应该有的一份清醒和冷静。在西班牙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油画《手提歌利亚头的大卫》突入眼前，卡拉瓦乔的名字，再次浮现心头，久久瞻仰忘掉挪步。其实同样题材内容他画过两幅，只是眼前这幅创作思路更为成熟，无可挑剔。大卫弯着身子手提歌利亚刚被砍下的头颅，神情肃穆，小腿衣饰处

理温婉周到，有点血腥气，光与影的技术手段处理得恰到好处，画面坚固，叙事性极强，把整个事件描绘了理性化后的瞬间平静，昏暗背景没有恐惧成分，这点卡拉瓦乔开先河，真正做到善恶分明。这样的作品能不撼动人的心吗？值得注明的是，画中这颗头颅依旧以卡拉瓦乔为模特的他自己的头颅，而大卫则以奇怪的悲伤神情注视巨人的带伤的头颅，这种带有技巧性的构图，只有卡拉瓦乔画得出。

卡拉瓦乔影响的不仅仅是巴洛克艺术，他是文艺复兴鼎盛时期以来不可绕过的一位艺术大师。正如他自己说的：“我的画不是让人凝视观赏的，而是让人深切体认的。”



他们哈哈一笑，我插了一句，说这回您又要苦干了。佐临先生余笑未绝，侧过身说，是啊，不过我提倡苦干，也不反对甜干，就像我主张穷干，也不拒绝阔干一样。我正要改预算，把排演的经费再提高那么一点儿。

佐临先生是富家子，原可从事经济，讨个阔小姐，终生富足清闲。他却先去伦敦学西洋戏剧，后回天津教戏剧课程，再娶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女朋友，又在上海发起了既无资金又无老板的“苦干剧团”。对于专注之人，“苦”不但不得事，倒成了“干”的藉口和动力。这恐怕也是他创建“写意戏剧”的一个原因，因为写意是以最少物质表现最高精神的法门，而这正是中华文化的优长和妙境，也是佐临先生的理想和追求。

这当然要以充足的才学作前提，但仍不够。才学易求，幽默难得，世上有才华有学问者众多，但因缺乏幽默，大多沦为庸常。幽默是基于才学又高于才学的东西，犹如宝剑的寒气或宝玉的暖意。唯有幽默，方能将才智充分地发扬，更变得出人意表而又令人快乐。佐临先生八十岁时为自己作了一篇题为《矛盾重重的黄佐临》的总结，一口气封了自己八个“家”。

“没有戏剧性的戏剧家”“没有示范性的导演家”是指他全然不写戏，几乎不演戏，却当了统率全剧的导演；“没有口才的演说家”是指他平素不喜多言，却因职业之故必须经常讲话。至于“没有被公认的幽默家”，我以为既是他对自己的最大肯定，又是对自己的幽默未被更多人认知的不满。

幽默一词，自被英国戏剧家琼生阐扬以来风靡了欧洲。林语堂将其引入



中国，以中西兼具的思维作了诠释，认为人智对付各种问题尚有余力，遂能从容出之，便生幽默，其背后是深远的心境，包括一点心怀慈悲的善念，一点宁静淡泊的达观。我服膺于此，又觉得不止于此，因为从佐临先生身上，我发现了幽默的另一重要因子，即以变通求进取的精神，具体说来，包含化繁为简、借力打力和天下大同这三层境界。

我以为幽默是一种化繁为简的能力。关于何为好的话剧，看法繁复，佐临先生说有两口气便可，一是人气，戏剧要有人看，多多益善；二是仙气，戏剧要有灵魂，飘飘欲仙。关于何为三大演剧体系，他说一种是要立“第四堵墙”，一种是要破“第四堵墙”，另一种则根本没有“墙”，不存在立与破的问题。前两种是外国的理论，后一种是中国的戏曲。精准的提炼，为他的行动提供了清晰的路径。

我以为幽默是一种借力打力的功夫。当年现实主义一家独尊，其他派别万马齐喑，他便提出布莱希特和梅兰芳看似不同，其实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样，都是现实主义大师。他的目的何在，人们未必理解，而他已开始动手做了。话剧是西方舶来品，讲求导演为主，崇尚

艺术为先。当他感觉到来自传统的以演员为中心的挑战时，便宣称导演工作同样要搞“民主集中制”，自己作为导演，就要像毛主席说的“善于当班长”，像邓小平说的“负总责”。佐临先生凭这工夫，成了一个经常达到目的，却从不需要动明火、发无功用的人。难怪他只是微笑，而幽默正善于生成一类以笑为表征的艺术；难怪他是如此偏爱导演各类喜剧，于是享有了“喜剧家”的美誉。

我更以为幽默是一种天下大同的胸怀。他说两千五百多年来，世界戏剧出现过无数的手段，但戏剧观基本只有写实和写意两种，而他要探索和创建的，是一种将二者融汇的戏剧观。在这种戏剧观下，所有艺术手段皆可生存，皆可发扬，于是他有了改编自《麦克白》的昆曲《血手记》，有了让两位演员在空空如也的舞台上扮演数十个角色的《中国梦》。在戏剧这一领域，他做到了“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回到家里，我把两本《我与写意戏剧观》并放在一起。此书仅印了一千多册，我这个外行倒有两册，可知当时话剧的寥落，就像黄昏里的秋雨。就在秋雨之中，一位戏剧大师向我冉冉走来。

八斗才高只等身，究

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书名出自于佛经，是指以“天”和“龙”为首的形貌似人而实际并不是人的众生。《天龙八部》借八种人间之外神道精怪之名，写的却是人世间的奇妙百态、悲欢离合之实，可谓“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这部小说的情节离奇曲折而略显松散，缘由于金庸其他几部重要小说均以一位男主角为核心人物展开，而《天龙八部》却贯穿着段誉、乔峰、虚竹三位同一重量级的主人翁。但这部多核推动的小说结构却是形散而神不散，三条叙事主线之间有分有合、交汇激荡，立体多维地展现了跨越北宋、辽、西夏和大理国场域的历史武侠风云际会。

小说第三册写到萧峰为报杀父之恨，阴差阳错向大理国镇南王段正淳寻仇，不料却误杀甘愿易容替父而死化解冤孽的红颜知己阿朱。此可谓到处弥漫着恐怖和悲悯气氛的小说中尤为柔肠寸断的一节。此册卷首选用悲苦凄婉的印文“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阙”，文辞出自描写南宋士子王十朋夫妇节义的元曲《荆钗记》，金庸附记为清代赵之谦作。但据《二金蝶堂印谱》所载，此印并非赵之谦一人所作，乃经由三位印人之手最终完成，背后蕴藏着篆刻文化史上悲慨伤心的故事。

赵之谦字叔权，号无闷，中年遭遇丧乱后自号悲龠，又自署二金蝶堂等，浙江会稽人，清代同治、光绪年间书画印人。其早年印作取法浙派丁敬厚古奥一路，之后由浙入皖，继以秦汉玺印为参，并独到地熔当时新出土的镜铭、钱币、权诏、碑版等古文字于一炉。从“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阙”(下图)一印可见，其篆文结体刀法等均已脱离浙派樊篱而自成一格。

赵之谦结发之妻同乡范，能诗善书，夫妻相濡以沫。不意在赵之谦中年避居福建之际，范氏夫人及女儿不幸相继贫病辞世。时值战乱，交通阻绝，天人相隔。悲伤欲绝的赵之谦只能在异乡为亡灵遥祭祈度，其间他曾篆刻有“悲龠”、“悲思翁”、“餐经养年”、“我欲不伤悲不得已”诸印并刻佛像，寄托对妻女的无尽哀思和怀念。

“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阙”也系上述这段时期悲龠排遣悲哀愁苦、伤逝忧愤之作，由悲龠手篆，交由弟子钱式镌刻。钱式乃浙派篆刻“西泠后四家”之一钱松之子，太平军杭州围城之役，钱松以岁老全家罹难，仅得年幼次子钱式侥幸逃出，后来投至父执辈悲龠门下。悲龠对其备加怜爱，悉心辅导，以期踵其家学、不绝薪火。钱式的印稿常由老师亲手改定，有时悲龠也将手写的印稿、款跋等交由钱式镌刻。可惜钱式体弱多病，“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阙”一印篆刻未竟而年少早夭，据传后四字由汪述庵续刻而成。不知细心分辨之下能否可见气息浓淡之差别？这方寄托着悲龠怀念亡妻的悲痛慨叹心境、一印而易三人之手的篆刻作品，被小说家用之于《天龙八部》的题记，不仅契合小说情境，也别有触怀感人之处。

须幽默可通神。庭喧步自从闲适，心悦身焉辞苦辛。今古短长胸底壑，中西虚实剧中轮。斯人已去斯文在，一笑之温感若邻。

2016年，为准备纪念佐临先生诞辰一百十周年的发言，我又把两本《我与写意戏剧观》并放

在一起。现下话剧好起来了，苦干穷干的少了，甜干阔干的多了，人气茂盛，就像旭日下的春草。可惜仙气稀缺，于是又听人谈起戏剧到底是向钱看还是向前看的问题。我用佐临先生的口吻重复了一遍：“这是一个问题。”

这得到了当时静安区委主要领导批示，许多媒体也纷纷对此进行报道。

去年，是建党95周年。我作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在年初递交一份提案，其中对中共中央阅文处旧址的保护利用又提出建议；相关部门予以采纳，并作了详细的答复。

如今，中共中央阅文处旧址连同近旁两幢民居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相关部门正在积极进行规划。这排原砖原瓦的历史建筑，必将成为上海红色历史地图中的亮点之一。

锦江小礼堂，让上海人觉得熟悉而神秘的地方。请看明日专栏。

可阅读的建筑 责编：史佳林

赞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院士

秦史轶

昔年浴血战旗红，炮火硝烟没海空。
挥御列强家国北，服威奸独岛夷东。
苍波卅载铸宝剑，皓首九旬为舳舻。
合浦珠还应有日，潜龙深处伏神弓。

注：报载黄院士离家三十余年，研制吾国第一艘核潜艇竟成。

上海的石库门，不仅是海派建筑风格的重要载体，更凝聚着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最近，途经坐落于闹市的中共中央阅文处旧址，端详着这幢老房子，内心真是难以平静。

党的“一大”后，中共中央机关曾长期驻沪。1930年4月，《中共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同志信》强调：由于环境险恶，“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文件保管处”。这时，在上海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今江宁路673弄10号），已悄然筹建中共中央阅文处，负责人是张纪恩。此系一幢砖木结构的石库门房屋，为一正两厢三开间，由张纪恩以其父亲名义租用，他对外用“小开”的身份作掩护。张纪

恩和妻子住在底层，楼上厢房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和阅批文件的地方。

1931年初，因为积累的文件、资料已很多，周恩来提出区别不同情况整理、保存文件的意见，并委托瞿秋白起草一个条例。瞿秋白接受任务，很快拟订了《文件处置办法》。

同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情报保卫机关即特科的具体工作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出于安全考虑，中共中央阅文处的文件、资料及时转移。1933年初，中共中央机关离开开城，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留存黄浦江畔的16箱文件、资料，由在沪中共中央

文库保存，虽经国民党、日寇、汪伪交替追查，最终安然无恙，于上世纪50年代初完整地入藏中央档案馆。

可以说，当年中共中央阅文处的设立，是早期党的档案

带着红色记忆的老房子

朱少伟

管理的重要举措，它所在的石库门房屋也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2011年8月，中共中央阅文处旧址被列为静安区不可移动文物。

在担任上海静安区政协委员期间，我曾专程去中共中央阅文处旧址考察。它是比较典型的老式石库门房屋，虽屹立

了大半个世纪，仍基本保持原貌；我由衷感到，驻足于此可阅读一段革命历史。而且，那里的年长居民非常热忱，有的带我看了前门门楣的精美雕饰，以及青灰砖墙镶嵌的暗红条纹和天井内楼上漂亮的木质格子窗；有的告诉我，1982年5月，革命老人张纪恩来过这里，他满怀激情地在楼上窗口站立良久，回眸峥嵘岁月。随着旧区改造的推进，中共中央阅文处旧址所在地块要进行动迁。

为了更珍视革命旧址和建筑遗产，我立即撰写社情民意信息《应尽快启动中共中央阅文处旧址的保护开发工作》，